

尚武精神:从虚名到实际

——军校生鲁迅及其人生选择

邵宁宁

内容提要 今人论及鲁迅早年经历,大都从其弃医从文谈起,而很少重视其从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到一度想进入日本成城学校,这样一种从军选择在其早期人生中的意义。这不但是他个人成长经验中不可轻忽的一个阶段,而且也反映了晚清自强思潮对整个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塑造和影响。虽然这样一种选择最终并未构成他真正的人生事业,但曾经的“军校生”身份,还是对其人格和文风的形成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早期鲁迅;军校生活;尚武精神;战士人格

DOI:10.15945/j.cnki.cn11-2722/i.2024.08.007

1898年的《戛剑生杂记》,是现存鲁迅最早的创作,关于它的内容,有很多可供分析的地方,其中也包括“戛剑生”这个“别号”所暗示出的尚武倾向。鲁迅是文人,但终生崇奉“战士”。这既与中国文化某种悠久的传统有关,也直接联系于他曾就学于水/陆师学堂这一生活实际。追溯这一切,不但可增进对其“战士”意识构成的理解,而且可以从一个个案更清楚地窥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精神转变的内在逻辑。

一、“戛剑生”的命意——千古文人从军梦

“戛剑生”无疑是一个体现着尚武精神的名字。戛剑生之“戛”,本为象声词。周建人说鲁迅当时“刻了两颗图章,一颗是‘文章误我’,一颗是‘戛剑生’意思是说,以前读书,做古文,耽误了我的青春,现在我要‘戛’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①是以其为拔剑之声,这自有其道理。不过,这段话是周建人说于晚年,其中不免渗入后来的人们对于鲁迅人生姿态的想象。传说中的剑之有

声,通常都不是因为拔出,而是因为受到敲击或别的什么原因。前者如《战国策》中的冯谖弹铗及《孔子家语》中子路弹剑而歌;后者如《拾遗记》《烈士传》中的“剑在匣悲鸣”传说^②。说的虽然都是剑,但表达的都更是“士”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精神状态与追求。特别是后者,到后来甚而凝定为中国诗人咏怀中最常见的典故。骆宾王《和李明府》:“讵怜冲斗气,犹向匣中鸣”;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钱起《适楚次徐城》:“感激念知己,匣中孤剑鸣”;陆游《长歌行》:“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清邵晋涵《南江札记》感慨宋人刘过不遇“读其集,感时抚事,血泪迸流,如秋笳之凄烈,如雄剑之戛鸣,精悍之气,非同时江湖诸子所及”^③,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所谓戛剑之意的源头^④。

要深入地认识剑在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生活中的意义,必须从它与“士”在传统生活中的地位变化说起。中国人用剑,有着极为久远的传统。中国文化对剑的崇拜,也有着

极其复杂的历史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代,学剑是贵族子弟教育中必要环节之一^⑤。即便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佩剑仍可成为某种身份的标志或象征。从史籍记载看,春秋战国之士,多仗剑行游。不但季札、子路都佩剑,就是沦落到作了孟尝君食客冯谖,剑也还可能是其成为士之身份和能力的某种象征。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建立之后,“士”的个体精神受到压抑。虽然不知秦始皇“销锋镝”是否包括了一般游士所用之剑,但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潦倒到要接受漂母之食,但仍会因为剑不离身而引来胯下之辱看,佩剑仍然是当时游士身份的主要象征。而从韩信以及之前冯谖的窘迫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一阶层正是沦落入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也正因此,剑也常和传统社会“士”阶层的英雄失路之叹联系在一起。

从前述的诸种传说,到李白《行路难(其一)》:“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到元稹《说剑》:“白虹坐上飞,青蛇匣中吼。及有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直至明人李开先《宝剑记》里的林冲之叹。以及陆游那随处可见的咏剑名句,如《宝剑吟》:“幽人枕宝剑,殷殷夜有声。人言剑化龙,直恐兴风霆。不然愤狂虏,慨然思遐征。取酒起酌剑,至宝当潜形。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三月二十七日夜醉中作》:“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不难看出,诸如此类剑能发声的说话的真实意义,其实不过是“士”对战斗生活渴望的艺术反映而已。匣中剑鸣到后来终成为表现壮士情怀的常用典故之一。

今人论及文人好剑,首先联想到的都是任侠使气,而常忽略了古人借剑言志,其实并不一径导向游侠,而其中更有一种从军的倾向。尤其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通过有意打压形成的对游侠力量的社会抑制,促使从军

更成为一种通过努力实现人生理想的实际选择^⑥。秦汉帝国建立之后,伴随着由昔日之“士”蜕变来的文人越来越被近置于俳优侍从的地位。仗剑行游、建功沙场,不时成为他们的梦想。诸如西汉终军、傅介子,东汉班超、南朝宗悫等弃文从戎的人物,一再成为两千年来古代文人不断倾慕的人格范型。终军的请缨、班超的投笔、宗悫的长风破浪,一再成为激励着不同时代的昂扬书生追求奋斗的人生梦想。而类似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价值选择,也屡屡成为表明古人尚武精神的一种典型语言。张华《壮士篇》有“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李白《送外甥郑灌入军》有“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张籍《少年行》云“遥闻虏到平陵下,不待诏书行上马。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李贺《南园》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黄景仁《少年行》亦有:“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太白高高天尺五,宝刀明月共辉光。”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男儿,对报国投军心怀过这样的梦想。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边塞征伐诗,成为一种表现文人豪迈情怀的传统。即便文弱多病如李贺、黄景仁,心中也常燃有这样的热情。不理解这种传统与激情,就不能准确地理解鲁迅这个别号中所包含的意义。剑在这里,与其说是具体的武器,不如说完全变为一种更为有为的人生象征。

在仗剑从军的话语中,有像陆游、辛弃疾一样的报国情愫,但无疑也有着和某种浪漫想象有关的因素。赵园讨论晚明文人喜欢“谈兵”风尚时说“在渊源古老的文武对立中,文人理就距‘武’最远,而有明一代文人的谈兵、入幕几成时尚,且为人所艳称。好纵谈天下事,好为大言,好谈兵,好谈经济,好指画方略,说‘大计’,原属文人习癖。归庄诗曰‘文人独好武,常怀投笔志’(《卧病》,《归庄集》卷1第58页);曰‘愿提一剑荡中

原再造皇明如后汉。’(《夏日陈秀才池馆读书》,同上第56页)兵之为事何事也!而文人正要借此非常之事为激情发抒。其时自负‘知兵’的文人中,确也有渴望于金戈倥偬、羽书旁午之际,更真切地体验生命力量。”^⑦这后一点,已不仅涉及历史,也涉及了某种浪漫主义文学起源的认识。对生命激情与生命力量的表现和渴望,是古今中外浪漫文学热爱革命、热爱火焰与剑的共同原因。这一点,就是在1898年前鲁迅手抄祖父《桐华阁诗钞·秋兴四首》之二咏“文士”里,也还能看得清“关山极目渐萧条,千古兴衰酒一瓢。马当风乘牛渚月,广陵潮接浙江潮。倚楼遗韵传长笛,横槊豪情付洞箫。投笔从戎怀往事,玉门今已老班超。”^⑧

晚清时期,文人对剑的喜好,虽然已颇有转向任侠一面的倾向,但联系到鲁迅投考军校及同期周作人自号“跃剑生”的实际,则其含义更侧重于从军也是不难想见的。这一点,从周作人写于1901年的《日记》中也可看得很分明“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⑨这里的“乘长风,破万里浪”“毛锥误我”“投笔执戈”都与鲁迅在当时的诗文别号中所表现出的雄心形成了一种完全的呼应。

二、晚清武备教育的兴起及其影响

关于鲁迅究竟从何时起取了夏剑生这个别号,周作人和周建人的回忆在具体时间上存在着一点差异。目前一般信从的多是周作人的说法,即“在南京学堂的时候,鲁迅才开始使用别号。他刻有一颗石章,文云‘戎马书生’,自己署名有过一个‘夏剑生’,要算早”^⑩。然而,按周建人的说法,则这也可能是在鲁迅去南京之前。光绪二十四年(1898),也就是鲁迅决定去南京报考江南水师学堂的同一年稍早些时候,绍兴一带曾盛

传诸暨武童杀死四个洋人,鲁迅因从《知新报》上看到介绍“美国和德国建立强大的海军,对增强国力会起作用。还有译载日本报上的文章和瓜分中国的地图”,激于义愤“刻了两颗图章:一颗是‘文章误我’,一颗是‘夏剑生’”^⑪。两种说法涉及的具体时间虽然相距不远,但意义颇有不同。按周作人的说法,鲁迅的尚武,与他进入水师学堂学习直接相关,可看作是这种人生选择的一种结果。按周建人的说法,则这可能是他进入水师学堂的前因。周作人的说法,证据在他1900年《日记》中抄存的《葑花杂志》上的署名。周建人说当时并不明白,“后来知道”如此,并没有说明是自己的推测还是听鲁迅说过。究竟哪一种说法可靠呢?确切的答案恐已无法获知,但联想到同期周作人自号“跃剑生”,以及兄弟二人共作《惜花四律》,署名“汉真将军(按:指周亚夫)后裔”,以及周作人后来进入水师学堂,可以确定的是,“尚武”这时对于鲁迅,已不再只是“文人最有豪杰向慕”的美学追求^⑫,而更可能是已落实的一种切实的人生选择。

对于鲁迅的考入南京水师学堂,今人多着眼于其自述之选择“无需学费的学校”^⑬,这当然是有根据的。不过,考虑到他后来的失望及思想转变,其中也未尝没有略去当初动机中更为积极一面的可能。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和后来的革命运动的紧张关系,学界对于晚清中国的武备教育与近现代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一向缺少充分的讨论。论及近代中国的尚武思潮,多从日俄战争前夕知识分子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及实践说起,而少有意识到其与晚清武备教育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一思潮的真正起源,并不在日俄战争之际,而是早在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之创设武校、编练新军中,就已孕育了这一思潮的诸多内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上奏请求改为洋操练兵,其计划得到清廷批准后,于该年冬于江宁成立自强军。1896年1月在《创

设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折》中他又提出：“窃惟整军御武，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得人则胜盛。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材。”^⑭这种将德国的全民皆兵体制和军事教育列为当时军事建设榜样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实际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从周建人的回忆及今天有些学者的研究看，鲁迅的考入江南水师堂，与这一思潮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⑮

就鲁迅投身的海军教育而言，中国近代海军教育开始于1866年福建船政学堂的建立。^⑯其后，“开图绘之馆，设练习之船，创水陆师之堂，肇于福建，大于北洋，流行于各行省。”^⑰1880年，李鸿章奏请设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两江总督曾国荃提请在江陵下关设水师学堂。1889年，志锐奏请“旨飭下沿海督抚，多设海军学堂，或于承袭难裔，或于驻防兵丁，聪颖能通汉文者，厚其薪水，责令练习。其有举、贡、生员愿习海军者，学能有成，请勿拘堂格，优加拔擢。务使风声所树，人人以尚武为荣，庶可收得人之效矣。”^⑱奕劻也请“飭令沿海闽、粤、江、浙各省广设水师学堂，挑选学生，但择身家清白，体气壮健，文字通顺，不拘一格，难裔、兵丁、生监咸与挑选，教以海军诸学，以北洋练船为总汇之区。”^⑲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中，江南水师学堂于1890年建成^⑳。

近代海军教育首先在通过对国防建设必要性的强调，突破种种制度、观念的壁垒，为中国接受新的世界文化打开了一条新路。从魏源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左宗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说的“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治水师不可；欲整治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船政之兴衰在于人才的培养”，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逻辑。

中国传统士子的立身之路，主要在参加

科举考试，而军事学堂设立的一个客观结果，是为当时的青年提供了一种新的立身之可能。关于毕业后的出路，《江南陆师招募章程》中即明言“将来学成，虽未必如科第之荣，而登进较速，则干城柱石，亦即在其中矣。”又云“人材贵乎历练。西国王子贵胄，均从千把做起。今各学生三年考满，毕业之后，派充哨长。一年后应派赴德国营中，再行加习一二年，并游历各国，以增见识。回华即派哨官。二年升帮带，再二年升管带，择优派为统领。”^㉑报国与寻找新的人生出路，其实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水师学堂的开办也的确为中国近代的文化自新开辟了最为重要的路径。严复、林纾、林传甲、林长民、林白水都和这一路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鲁迅进入水师学堂求学的意义，也必须在这一历史脉络之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这些学堂的设立，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为当时的青年提供了面向世界的新的知识视野。军事上的需要，打破了文化领域的惰性，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关于这些学堂学生所要受的教育，早在1885年李鸿章创设天津武备学堂时即规定“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遴派德弁充当教师，挑选营中精健聪颖、略通大义之弁目，到堂肄业”；并充分考虑“独是泰西武备之学，皆从天算、舆地、格致而来，欲造其极诣，必先通其语言文字，乃能即事穷理，洞见本源。”^㉒1890年，曾国荃创设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也规定“参仿北洋章程并照英国训练水师方法，分列驾驶管轮两门，延订英国水师教习二员，洋文汉教习四员，在堂分班训练。”同时还规定，“学生每日傍晚放学后，均由赴习艺场习泰西跳跃攀跻各种武艺以壮筋骨。”^㉓《江南陆师学堂招募章程》亦规定“洋教习功课。内有攀跻及击刺等艺。各生于傍晚放学，闲步舒气时，应再自行加习，以壮精骨。”^㉔这自然对这些青年的人格构成、精神气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少人说到鲁迅的

青年时代,都会说到他当年的喜欢骑马、习技击,大都只从个人喜好上去理解,而未意识到这其实正是这段生活培养成的习惯。

钱理群在《我读〈鲁迅在南京〉》中说:“过去我们因为鲁迅批评水师学堂‘乌烟瘴气’而完全忽视,甚至否定洋务运动中的中国新式教育的意义,恐怕失之片面。事实上,水师学堂、矿路学堂的教育,对鲁迅的影响,其主要方面也应该是正面的。”²⁵关于这一点,或许的确需要我们从鲁迅知识知识结构、人格形成,乃至对现代世界文明的态度等方面,再做通盘的考虑和深入的研究。

三、军校生鲁迅的希望与失望

鲁迅投考军校,首先遇到的就是改名问题。1898年5月7日他到南京,寄居于时任江南水师学堂管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家,因周椒生认为当兵不体面,不宜用家谱上的名字,改“樟寿”为“树人”²⁶。当兵不体面,这是当时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周建人回忆,鲁迅进江南水师学堂,走前,家人都认定是“去当兵的”,寒假回来穿着制服,引起弟弟的羡慕。但周围人的看法是“这是兵!”如:“五十伯说‘这是兵!’伯文叔说‘这是兵!’好多人说这是兵!”但鲁迅却“以此为荣,除‘戛剑生’外,又自号‘戎马书生’,还学骑马,可是回到家里来,好像不光彩了。这也难怪,因为大家还相信‘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哩!”²⁷对于周建人的回忆,多有不信从者,但就此节而言,所反映的却无疑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里同样有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就是传统社会何以一直看不起当兵的?这不但和中国“士”文化的演进史相关,也和长期以来“兵”的实际构成有很大的关系。抗战时期,历史学家雷海宗追究中国文化积弱的原因,曾将秦以后中国的文化概括为“无兵的文化”。在他看来,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中,“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

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无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而“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²⁸。他甚至认为“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²⁹。“中国社会自汉以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³⁰。从历史来看,早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就已注意到了这个“兵”的问题。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

先王之时,士之所学,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中略)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之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³¹

在很大程度上,这都可以被看作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募兵制所造成的问题。而只有像王安石所主张那样,“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立自主。”³²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上奏请求改为洋操练兵,批评清军弊端,就包括“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等问题。³³募兵制下应招入伍的士兵,既包括“凶悍之徒”,又包括罪犯、无赖之徒,遂形成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语。³⁴这样的军队构成,必然决定养兵被看作是社会的巨大负担,压低士卒的薪饷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待遇的低下,又进一步降低了当兵者的社会地位。军队没有好的兵源,社会看不起当兵的,就成为一种社会的常态。就如历史学家所指出,在清朝的绿营兵制下,因为

“兵之口粮,尚未能贍养一身”,所以到后来“不得不兼做‘工匠’或从事‘贸易’,以求糊口。”“对于缺乏政治信仰、素质很差的雇佣军队来说,更是如此。”³⁵正因如此,晚清编练新军时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提高薪饷。即如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所说“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³⁶由此,“新建陆军官兵的薪饷是相当优厚的,超过旧式清军官兵薪饷1-2倍。”“实行厚饷制,不但有利于固结军心,使官兵安心服役,而且还能相应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有利于破除重文轻武的陈旧观念。”类似的厚饷制度,同样为张之洞所采纳。³⁷

近代以来知识界对“兵”的态度变化,其根本在于甲午战争失败所引起的民族反思。痛感于战争的失败,如何缔造一支适应现代世界生活的新型军队,就变成晚清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种从思想上试图重新认识“兵”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样首先来自日本的刺激。1899年梁启超写的《祈战死》一文,写他冬日游上野,看见满街迎送战士入伍的旗帜标语,发觉“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其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而对其送行标语中有题“祈战死”三字,尤其“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进而反思“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³⁸其后,作《中国魂安在乎》,又指出除了“吾中国向来薄军士,其兵卒不啻奴隶,则谓从军苦也固宜。”更在“今中国之有兵也,所以钐制其民也。”“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又批评荣禄、张之洞之徒,虽然懂得军队的重要性,但因军家和士兵根本立场上的不同,“方且相视以盗贼、以待以草芥,虽欲振之,孰从而振之?”继而引出如下观点“今

日所最要者,则制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³⁹

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们所做的工作,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不过在当初,对于创建一支近代化的军队,这也是一种筚路蓝缕的工作。现在提及江南水师学堂时,大都会提到鲁迅所说的“乌烟瘴气”,而很少注意周建人回忆所说的鲁迅初入水师学堂时的“以此为荣”,显然都是以后来的追述覆盖了其最初的印象。

晚清武备教育(乃至整个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有一个历史的过程,鲁迅对自己所受水师学堂教育的态度,也有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1890年江南水师学堂开办,到次年就因担心毕业生无处安插而裁减学生和教习人数。再加上主事者对之认识和期待不一,实际教学出现不少问题自是难免之事。1894年,甲午海战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6年,张之洞奏请恢复江南水师学堂被裁减的名额;1898年8月,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加强水师学堂建设;同年5月,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这时的招生要求已然不高,所招入者有不少属“士宦落势之家”的子弟,一方面“思想守旧”,另一方面“玩愒时日”。⁴⁰这也是理解鲁迅从水师学堂退学不可不了解的一种背景。

如今再看鲁迅有关水师学堂的描绘,的确是很有点漫画味儿的:

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⁴¹

这里所传达的,无疑都是其经历失望之后的

回顾和印象。其中混杂着密不可分的嘲讽与自嘲。即如说到唯一有点可爱的“桅杆”，“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这可以说是最具有海军学校特点的东西，然而其实际意义，却不过是看风景的工具。这样描写，似乎已开了后来韩东《有关大雁塔》中那个著名的讽刺的先河。接下去的叙述，更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听说这里“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但后来却因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又有一座上方写着“敬惜字纸”的焚化字纸的砖炉，因为有了淹死鬼，每年七月十五，又“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对于这样的军事教育，除了“乌烟瘴气”，还能说些什么？然而，从这清晰可见的“失望”中，折射出的也未尝不是当初曾有的希望。

晚清的武备教育，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即在创办者的指导思想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希望借之增强国防力量，另一方面又怀有中国文化在受到相对强势的异文化冲击时被其同化的深刻隐忧。早在1887年，张之洞在其《奏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奏折中就已明确规定“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遇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⑫而在后来更规定“学堂设汉文教习六员，驾驶管轮学生分时讲授《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吴兵法》《读史兵略》诸书，并有经济之文以扩知识，定期由教习命题作论以呈送改阅。”^⑬《江南陆师学堂招募章程》中要求“学堂设汉文教习四员，照排定功课单，按时教授经史，以及《春秋》《左传》《战国策》《武经》诸书，并有益经济之文，以扩知识。定期教习，命题作论，呈送改阅。”在看上去迂阔的作为中，实际上也包含

着某种相当复杂的因素。一方面希望从西化中获得某种现代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失去与中国文化母体的联系。正是这种心态，决定了它所行的只能是一种不新不旧的教育，也造就了鲁迅《琐记》回忆中所提到的这种令其失望的教育状况。“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虽是新兴的武备学校，但除了学一点简单的外语，这里似乎就没有多少新的气息。这对于既有扎实的传统修养，又对新的知识文化充满渴求的鲁迅，其无味不问可知。除了学校的整体氛围和它的教学体系，令鲁迅感觉“乌烟瘴气”的还有同学关系。日常生活中的军校生，不但三班生和头二班生待遇不同，前两班学生的骄横也令其印象深刻。“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

与周作人到后来也始终承认自己曾经的军校生出身不同^⑭，鲁迅后来谈到这一切时，却一再有意淡化、压低这段生活对他所具有的意义。1926年他所写的《坚壁清野主义》中说“兵家非我的素业”；《琐记》中说“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1927年4月在黄埔军校演讲，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1934年写的《自传》也说“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又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⑮“上不了舱面”就意味着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军官，这也是促使他从水师学堂退学的原因之一。^⑯后来的鲁迅，的确是从水师学堂退学进入了矿路学堂。不过不应忘记的是，这矿路学堂，其实也是附设在陆师学堂之中的。^⑰也就是说，南京四年的鲁迅，其实始终都没有脱离军校生的身份。就是1902年被两江总督选派赴日留学，按

周作人后来的说法“原来目的当然是继续学开矿去的吧”⁴⁸，但就当年的家信中所说的“不日进成城学校”⁴⁹来看，最初鲁迅想上的还是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只是限于清朝公使与日本政府所立的“定例”，因其实质所学是采矿而非陆军，所以只好改入弘文学院学习。⁵⁰

四、旧时“豪情”及其人生回响

中国文学中的尚武精神，由来已久，到近代更因时势的刺激而生出种种新的境界与意义。虽然很早就放弃了“从军梦”，但这一段生活对鲁迅的人生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后来在提到江南水师学堂时的生活时，多会带一点嘲讽的口气，但说到那时的爬桅杆、骑马，却也常带有一点得意的神情。无论如何，这段生活在他身上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死火》里说“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⁵¹显而易见，在绍兴是不可能看到“快舰”的；乡村铁匠铺里飞溅的火花也很难被说成“洪炉”。这都只能是他在读水师学堂、矿路学堂时才能获得的视觉印象。这里的“幼小”，大概只能看作是“年轻”的另一说法吧。就此而言，就是在他对军校生活做出“乌烟瘴气”评介时，其中或许也隐含着一种希望落空的失望吧。还有他一生都以战士自许，在很多时候都只被看作是一种象征。但1935年他写信给萧军，谈及“堑壕战”，却说：“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⁵²。也可谓在不知不觉间还是承认了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除了一生尊崇“战士”，这段经历也培养了他对军事的熟悉和敏感。即如叶公超所指出，他的文章中“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⁵³，同时也非常喜欢用信手拈来的战争比喻，如“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

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⁵⁴。这一切无疑都和他早年有过的这段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从《热风·五十四》对黄郛《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文有关晚清以来中国兵制变革的反思的称许⁵⁵，更可看出他对中国问题的更为理性的反思，也来自于他这段早期经历。

写于1902年1月12日的《挽丁耀卿》，是现存鲁迅1902年3月东渡之前最后的创作。其联云“男儿死耳，恨壮志未酬，何日令威来华表；魂兮归去，知夜台难瞑，深更幽魄绕萱帟。”丁耀卿是鲁迅在矿路学堂时的同乡同学，1902年1月5日因病去世。同学中除鲁迅还有一位蒋桂鸣的也写了一副挽联“使君是终军长吉一流，学业得成，三年呕尽心头血。故乡在镜水稽山之地，家书未达，千里犹缝游子衣。”从内容看，两联均是上联言志，下联抒情，虽然就所言之“志”而言，仍未脱开旧式文人所作“豪语”的拘限⁵⁶，但其中也能说完全没有一些和这段军校生活所激发的人生想象有关的东西。

鲁迅对军校生的消极印象，一直延续到了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的确是被派去学习开矿的，⁵⁷但到那里之后，很可以有别的选择，包括进入军事学校。他的同学朋友中就很有几位学了军事的人，比如到后来他还戏言要跟随去吃粮的陈仪，以及担任过《浙江潮》主编的蒋百里等。但鲁迅对这些学军的同学的整体印象似乎都并不怎么好。鲁迅留日时的同学沈颀民回忆，看到成城学校中国留学生的骄傲样子，鲁迅曾写过一首宝塔诗：

兵
成城
大将军
威风凛凛
处处有精神
挺胸肚开步行

说什么自由平等 哨官营官是我本分

许寿裳回忆“鲁迅在留学生中是以风趣横生闻名的”，沈氏当年在东京又曾与鲁迅同住一室，倪墨炎据此认为说它是鲁迅的作品“基本上是可信的”，并断为1903年3月至1904年春的一年间所作。^{⑤8}尽管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所有研究者的认可^{⑤9}，但其中描绘的情形，颇让人想象起《琐记》中水师学堂那班“便是空着手，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的高班生形象。“说什么自由平等/哨官营官是我本分”从胸怀报国壮志，到谋求一种固有身份，对军校生身上可能存在的这种理想失落的失望，也是鲁迅要躲开东京到仙台去的原因之一吧。不过，不该忘记的是，即便在做出这样的选择时，他最“美满”的梦想中，也还是包括了“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的“从军”想象^{⑥0}。

鲁迅一生，对于自己的这段生活，始终都抱有复杂的感情。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他都有点刻意贬低、冷淡这段经历的意义。这中间当然包含了他对晚清武备教育的批判，但同时，也不无某种自嘲和反省。后来的他，曾一再批评中国文人自来就有好作“豪语”的传统。讥笑“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陆放翁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他有一回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⑥1}虽说是讽刺时弊，但其中是否也有些自嘲的意思，也是很可玩味的。1935年，在一封致山本初枝的信中，他再一次承认自己“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但说到原因，却只说因为“他的诗晦涩难懂”。这或许是真的，然而若联想到《豪语的折扣》，则包含在这“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中的，恐怕也不限于文风一端吧。“戛剑生”也罢，“戎马书生”也罢，说到底也都是些“虚名”“豪语”吧，就连那一段

不久后即被放弃的“从军”经历，若从后来成熟的眼光看，似乎也都有点虚有其名。

不过，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从长时段和短时段来看，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同。1933年6月，杨杏佛被杀，鲁迅写下了著名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其中的“旧时豪情”究竟指什么，的确是很可玩味的。但无论如何，这中间也包含周建人所说的穿着军装走来走去，以及到日本后学习武术，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那段经历吧。

今天的人们说到鲁迅的早期经历，大都主要从弃医从文谈起，而很少注意在此之前，他还有一段弃武从文、弃武从工的经历，而这一切对于理解早期鲁迅思想的形成，也绝非无关紧要的东西。从大的方面看，晚清中国之所以突破旧的科学教育体制，正是缘于这样的“强兵”要求。不但如此，鲁迅也正是因此才获得了对世界、人生的某些具有近代意义的了解，并建立起自己以科学为基础的新的知识谱系，并经由这种教育，培植起他对德语及德国思想文化的最初认知，培植起他对体育以及与后来被称之为“军国民教育”有关的许多内容的兴趣。从这样的失望中走出的文学家鲁迅，一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段经历的印记。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始终如一的“战士”理想。关于这一切，虽然已有过不少论说，但深究起来，仍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注 释：

- ①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增订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下同），第114页。在周作人的回忆中，两颗图章中的另一颗是“戎马书生”。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5页。
- ② （东晋）王嘉《拾遗记》：“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剋伐。未用之时，常于匣中如龙虎之吟。”《烈士传》：“楚王命莫邪铸双剑，止以雄进，剑在

匣悲鸣。群臣曰‘剑有雌雄，鸣者雄忆其雌。’”

- ③ 《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 118 引，《山右丛书初编》第 1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5 页。
- ④ 又《晋书·张华传》：张华与豫章人雷焕“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后来张华被杀，“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晋书》卷 36，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75 - 1076 页。周作人号跃剑生，显然与此有关。
- ⑤ 参《史记·项羽本纪》。又据《太史公自序》，司马氏祖上在赵国的一支，也曾“以传剑论显”。参马明达《“虎贲之士说剑”解》，《说剑丛稿》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9 页。
- ⑥ 这种选择的最好例证，当为《水浒传》中杨志所谓“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这不仅是杨志，也是包括王进、林冲在内的众多不得志人物的共同理想。《水浒全传》中的宋江，也正是以此将“群雄”引入了为国效力的道路。
- ⑦⑫ 赵园《谈兵——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陈平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统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 6 页。
- ⑧ 董炳月《书信·祖父·抄古碑——阅读〈鲁迅手稿全集〉札记》，《名作欣赏》2023 年第 5 期。
- ⑨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2 页。
- ⑩⑳④⑧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 5、4、32 页。
- ⑪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增订本，第 113 - 114 页。
- ⑬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下同），第 85 页。这一点，也得到了周作人的证明“他（鲁迅）之所以进去也并不是因为志愿当海陆军人，实在只为了可以免费读书罢了。”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 96 页。
- ⑭ 高时良、黄仁贤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下同），第 520 页。
- ⑮ 近来研究中，颇有肯定后一因素者。如刘润涛就认为“对鲁迅决心学水师起到重要影响的是《知新报》关于胶州湾事件及水师重要性的报道。”《鲁迅“走异路，逃异地”考述》，《鲁迅研究月刊》2019 年第 6 期。
- ⑯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督闽（中略）保沈葆楨为总理船政大臣，设学之事属焉。是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林献焄《海军各学校沿革之概况》，《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下同），第 430 页。
- ⑰ 何熙年《上张香帅言武备学堂事宜书》，《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 443 页。
- ⑱ 志锐《请飭沿海督抚多设海军学堂折》，《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 439 页。
- ⑲ 奕劻《请飭令沿海各省广设水师学堂折》，《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 440 页。
- ⑳④⑩ 陈占彪《江南水师学堂考（上）》，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4 - 141、148 页。
- ㉑ 《江南陆师招募章程》，《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 523、524 页。
- ㉒ 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 511、512 页。
- ㉓⑳④③ 《江南水师学堂简明章程》，《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 493、523、493 页。
- ㉔ 徐昭武编著《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下同）第 2 页。
- ㉕ 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有意思的是，房向东编《活的鲁迅》时还为这段话加上了一个标题《“兵”哥回乡》。参见房向东编《活的鲁迅》，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2 页。
- ㉖⑳③② 雷海宗《无兵的文化》，《中国兵史——畸形兵制下的中国的病》，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7 - 68、第 65 页注 1、81、第 65 页注 1 页。
- ㉗（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高步瀛笺释，陈廷焯整理《唐宋文举要》中，崇文书局 2019 年版，第 920 - 921 页。
- ㉘ 《署江督张之洞奏创练新军须选乡民责成洋

- 将管带操练折》，《清季外交史料》第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4页。
- ③④ 郭建《金戈铁马——兵制与军事》，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6页。
- ③⑤ 陈崇桥《清末新建陆军后勤史论》，徐玲主编《清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 ③⑥ 《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转引自《论袁世凯的建军治军和军事教育思想》，《晚清军事变革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第348页。
- ③⑦ 参见施渡桥《晚清军事变革研究》，第348、330页。
- ③⑧③⑨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7页。
- ④①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3页。
- ④② 张之洞《奏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6页。
- ④③ 写于1935年的《弃文就武》开头就说“我是江南水师出身的。”“在我没有专门职业的专门中，计算起来还要算是海军。”周作人《弃文就武》，《苦茶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2页。
- ④④ 《鲁迅全集》第1卷，第272；第3卷，第307页；第4卷，第436页；第8卷，第401页。
- ④⑤ 论见董炳月《论鲁迅的“南京记忆”》，《攷心者说：论鲁迅的政治与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1页。
- ④⑥ 保存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1904年鲁迅申请入学时提供的《学业履历表》，也写明“本国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学习”，《鲁迅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 ④⑦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1902年4月23日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 ⑤① 马力《鲁迅在弘文学院》，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 ⑤② 鲁迅《野草·死火》，《鲁迅全集》第2卷，第200页。
- ⑤③⑤④ 鲁迅《书信·351004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第558页。
- ⑤⑤ 叶公超《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原载天津《益世报》1936年11月1日。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 ⑤⑥ 鲁迅《热风·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60-361页。
- ⑤⑦ “男儿死耳”，语出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旧时常用来形容奋不顾身，慷慨赴义。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词语，后来也出现在到日本后所做的《斯巴达之魂》中。见《鲁迅全集》第7卷，第10页。
- ⑤⑧ 1902年4月11日，驻日公使蔡均写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介绍鲁迅等六名留学生的公函中说“本大臣兹准南洋咨派矿务毕业生六名来东洋研究矿学”。徐昭武编著《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第53页。
- ⑤⑨ 倪墨炎《一首“宝塔诗”》，《鲁迅旧诗探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306页。
- ⑤⑩ 刘运峰《关于鲁迅佚文的辑录与辨伪问题》，《版本·文本·故实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播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6页。
- ⑥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
- ⑥② 鲁迅《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鲁迅全集》第5卷，第256页。类似的意思，亦见于《准风月谈·文学上的折扣》，《鲁迅全集》第5卷，第61-62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古典传统重释重构及其互动关系史研究”（21&ZD267）阶段性成果
（作者通讯处：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邮编：311121）

责任编辑：何巧云